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孙宏云  
编

# 钱端升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孙宏云  
编

# 钱端升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钱端升卷/孙宏云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300-18828-7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钱端升 (1900~1990)-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9023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钱端升卷

孙宏云 编

Qian Duansheng Juan

---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 邮政编码 | 100080              |
| 电 话  | 010-62511242 (总编室)                                                                                                               |      | 010-62511770 (质管部)  |
|      | 010-82501766 (邮购部)                                                                                                               |      | 010-62514148 (门市部)  |
|      |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      |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br><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      |                     |
| 规 格  | 160 mm×230 mm 16 开本                                                                                                              |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
| 印 张  | 33.75 插页 2                                                                                                                       | 印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字 数  | 540 000                                                                                                                          | 定 价  | 79.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径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 导 言

钱端升，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之一。关于他的学问，其同辈学者评价甚高，在其身后也多无异议；而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和进退出处，则有赞有弹。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大概因为学术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而如何看待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则通常受到评论者的政治倾向和利益诉求影响。钱先生一定深明此中道理，故在生平自述中说：“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sup>①</sup> 1990年钱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在遗体告别仪式前散发的《钱端升同志生平》中对他的生平事迹有这样的评价：“钱端升先生一生正直，光明磊落，工作勤奋，生活俭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为我国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国杰出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愧为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学习榜样。”不论功过是非，评论历史人物必须从史料出发，设身处地，同情理解其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 一、生平事略

1900年2月25日，钱端升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今上海市闵行区曹行乡）的钱家塘。钱家世代以行医为生，同时也操耕织。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钱端升开始由父亲和伯父们教读识字，接着入读私塾，直到1910年夏。期间不仅背诵“四书”、《史鉴节要便读》、《诗经》、《左

---

<sup>①</sup> 《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702页，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传》和《唐诗三百首》部分篇章，还随同族各家延聘的一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的塾师学习国文、数学、英文、史地等新学科目。1910年下半年，钱端升随堂兄到上海城内就读于敬业学堂。一年后转入养正学堂，至1912年冬小学毕业。1913年春考入松江（江苏）省立第三中学。至1916年秋转读上海私立南洋中学，插入五年级，次年夏毕业，报考清华学校，被录取进高等科三年级。1919年夏从清华学校毕业，获官费赴美留学。

到美后，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四年级攻读政治学。翌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先入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系，旋入哈佛大学。1922年6月，被哈佛授予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11月完成哲学博士所需课业并通过各种考试，结束在哈佛的学业。随后借由校长洛厄尔（A. L. Lowell）的介绍函，漫游欧洲各国半载有余，就教于英、法、德、奥等国一些宪法或政治学教授、学者，访问各国议会议员和工作人员。1924年夏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4年5月，钱端升结束游学生涯，回到祖国。秋季应聘为母校清华学校历史教员，主要讲授西洋近百年史。时曹云祥担任清华校长，为了提升教师素质，大量聘用清华留学生，以逐渐取代美国教师。与此同时，亦致力于将清华改制为大学。钱端升出于对母校的热忱，积极参与校务讨论。在上大学筹备委员会会长的意见书（原文为英文）中，钱端升主张清华应以全副精神先办一文理科大学，以养成士风。因为在他看来，“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反是，则世愈衰，而国愈乱”。并对1924年10月21、22日经大学筹备委员会之课程及计划组通过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清华周刊》第332期）提出商榷意见。随即又发表《清华学校》一文，直言清华的弊病，并提出改良的途径与方法。

当时清华教职员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教务长张彭春为首的“南开派”，一派是清华少壮派。庄泽宣、吴宓、钱端升等属于后者。<sup>①</sup>双方在年底的校长人选问题上爆发激烈冲突。结果张彭春被迫离开清华，引起旧制学生不满，要求斥退“元凶”王祖廉、庄泽宣、徐

<sup>①</sup> 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8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然，将全绍文、曹霖生、虞振镛、陈达、蔡正列为“次凶”，张敬海、钱端升、吴宓列为“陪凶”。<sup>①</sup> 在学生看来，钱端升行事较公开且多出于心，因此没有将他列为“元凶”。风潮过后，钱端升被全体教职员大会推举为清华学校改组委员会委员，与其他六名委员共同起草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后经清华教职员会议通过，交由校长执行。该大纲的要点为教授治校和实行分系制。<sup>②</sup> 该大纲还规定 1930 年大学院开办时取消国学研究院，据称，“此乃钱端升之意”<sup>③</sup>。

1925 年秋，清华建立大学部首次招收本科生，此后逐步成为一所完全的大学，清华教师遂分为研究教授、教授、讲师、教员四种类型，钱端升担任政治学系教授兼历史学系讲师。<sup>④</sup> 1925 年 12 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1926 年 11 月，经高仁山、陈翰笙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 年春季，钱端升开始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授政治和法律两系的宪法课。1927 年春夏，奉系军阀入关，对教育界、报界人士极为横暴，钱端升于是南走沪宁，秋季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任政治系副教授。1928 年曾一度在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兼任文化事业处处长。1929 年秋，由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民党派系之争和学生罢课，钱端升被迫辞职。<sup>⑤</sup> 失业赋闲期间，他翻译了屈勒味林（C. M. Trevlyan）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1930 年秋，钱端升再次受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同时在北大兼课。“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蒋介石创办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周鲠生、徐淑希等负责国际关系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sup>⑥</sup>

1934 年初，钱端升赴天津接替罗隆基担任《益世报》主笔。《益世报》当时是北方两大报之一。钱端升在担任《益世报》主笔的 8 个月期间共写了 170 篇社论，对国内外各种热点问题发表意见，尤其重视对日问题，揭露与驳斥日本侵华阴谋及其罪行，大声疾呼各界人士放弃对日和平幻想，积极做好抗日准备。因笔锋触及对日妥协派，蒋介石大为恼

① 参见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 3 册，147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② 参见《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载《清华周刊》，第 376 期，1926 年 4 月 27 日。

③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 3 册，153 页。

④ 参见清华大学档案《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四年度教职员录》，全宗号 1，目录号 4—5，案卷号 1。

⑤ 相关背景参见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160—192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⑥ 参见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41 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火，立即勒令邮局停邮《益世报》，钱端升被迫于1934年9月离开报社。后适南京，再度受聘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希望钱端升来法学院以便加强其学术气氛。但是中央大学仍然派系林立，钱端升除偶尔代理法学院院长职务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政治系附设的行政研究室的工作。

1937年夏，钱端升受聘为北大教授，刚到北平一周，卢沟桥事变爆发，接着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争。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争取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派胡适、张忠绂和钱端升等北大三教授赴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次年6月，钱端升被遴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从法国搭船回国途中，应蒋梦麟之请决定到北大任教，当时北大已与清华、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8月回国后，即任教于西南联大法学院政治系。自此至抗战胜利后第二年返回北平，钱端升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教书之余，钱端升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在此期间，他发起创办《今日评论》，围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战后重建等问题共发表了58篇时评，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从主张国民党一党政治到最后呼吁成立联合政府。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在1946年5月正式宣布解散，钱端升于同年秋回北大执教。1947年10月底应邀赴美，在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约一年。1948年3月，钱端升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8年秋，国内解放战争进展迅速，钱端升没有听从美国友人劝他暂时留美教书的建议，决心回国，经多方设法，于1948年11月终于回到北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5月，钱端升被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法学院院长。8月，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副主席。9月，以社会科学工作者身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始终积极关心国内政治生活，并热心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作为一名政法教育工作者，他还参加了政务院的文教委员会和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曾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兼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二届政协常委，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委，第六届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钱端升被抽调筹建北京政法学

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院系调整后，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钱端升的研究工作也只得就此中断。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活动。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对外友协副会长，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积极推进新中国与各国非政府间的外交活动。1954年他被邀请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钱端升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遭受了磨难。所幸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下，他还能够饥即食、病即医，并在1974年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属耄耋之年的钱端升，又受聘于北大、外交学院，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科的恢复与建设发挥号召与指导作用。

钱端升一生著述甚丰，先后撰写了《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比较宪法》（与王世杰合著，1936）、《民国政制史》（主编，1939）、《建国途径》（1942）、《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1950）等学术专著，其中《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被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此外还翻译了屈勒味林的《英国史》（1933），为王云五、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选注过四本英文政治学经典著作。并且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以及政论与时评，散见于《清华周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现代评论》、《东方杂志》、《益世报》、《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独立评论》、《今日评论》、《世界政治》、《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云南日报》以及《美国政治学评论》、《外交季刊》、《太平洋季刊》等中英文报刊。

1962年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部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从五六十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酌择其要旨，译成中文。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120万言，其中大部分并经他亲自校阅审定。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该书至今尚未得以出版。

## 二、学术研究的成就与方法

钱端升自1917年涉足政治学专业，遂与政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晚年他在《自述》中说：“我一向认为，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1949年以前，基于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和制度昌明的理想，我不但著译了几部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论述中国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制度的书籍，而且也写过大量抨击时政，评述时势，论证国际关系对策以及政治学书评等类文章。”钱端升的学术成就大体上是在1949年之前取得的，主要在政治学方面，涉及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各国政府的制度及其实际运行，以及国际关系。

留学期间钱端升的学术成果当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代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Thomson S. Chien, “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American Congress,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and German Reichstag,” Harvard University’s Dissertation, 1923）是关于英美法德四个国家议会中的委员会的比较研究。查默斯（Chalmers）称其“研究是法律的与制度的，这是1920年代学院政治学的一般特征”<sup>①</sup>。

1925年12月3日，钱端升在清华学校作关于政治学的演讲，演讲内容随后以《政治学》为题刊登于《清华周刊》上。这篇演讲表达了钱端升对政治学有一种系统的看法。他首先将政治学定义为“研究人类政治活动及其政治组织者”。接着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三大类：甲、政府，包括：一、起源及发展——宪法史等；二、组织，包括宪法学、比较政府、某国政府、联邦政府等；三、职务之执行，分立法与行政两部分，司法乃行政之一种。乙、政事（政治活动及原动力），包括舆论、政党、政治心理、阶级制度等。丙、国际关系，分国际法、国际组织、联邦、外交、帝国主义等。并表明该分类为其“个人之分法，乃聚欧美各大学之政治科目而分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大陆仍注重从历史、哲学及法律角度来对国家现象、政治组织进行抽象的静态研究的时候，英美则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政治的动态过程，从法律形式主义转向现实中“行动着的政府”（a government in action），本特利（A. F. Bentley）、威尔逊（W. Wilson）、洛厄尔是其中的主要倡导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

<sup>①</sup> Chalmers A. Johnson, “An Intellectual Weed in the Socialist Garden: The Case of Ch’ien Tuan-sh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 (Apr. -Jun., 1961), p. 31.

国的政治学研究呈现出如钱端升所说的特征——“忽视政体方面之研究，而重视职务方面之研究，忽视形式方面之研究，而重视运用方面之研究”。钱端升留学的哈佛大学正是其校长洛厄尔提倡与实践对“行动着的政府”进行研究的学术重镇，钱端升对政治学的上述定义与分类正体现了洛厄尔等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贯穿于钱端升的研究实践，正如他晚年所述：“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以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作为我的主要课题。”<sup>①</sup>

钱端升的博士论文体现了他追随洛厄尔、威尔逊等人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以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宪法入手，注意政制的实际运作，通过比较研究归纳出不同政制的共同特点和变化趋势。此后，他的研究对象扩大了，特别关注东欧和中欧一些国家新成立的政府。这大概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治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普遍采用民主制度，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由专制走向民主首先就表现在新宪法的制定上。当时中国的情形与之相似。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都得到了极大传播，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将“制宪”视作国家政治进程中的大事，另一方面希望遵循法律途径解决“治外法权”和租界问题。1920年代中期回国的钱端升正好赶上这股政治潮流，于是注意对新兴的民治政府进行比较研究，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及书评几乎都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如《新近宪法中立法行政两机关之关系》，“Malborne W. Graham: New Governments of Central Europe”（《中欧新政府》），“Dr. Julius Hatschek: Deutsches und Preussisches Staatsrecht”（《德国与普鲁士宪法》），“Leon Duguit, Trait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宪法论》）。

但是到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钱端升又转而关注德国、苏联和西班牙等极权国家的宪法与政府。1933年就连续发表了《德意志的国会及国会议员》（《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西班牙新宪法》（《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3卷第4号）、《希忒勒秉政前的德意志政党》（《民族》第1卷第9期）。次年元旦发表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明确表达了钱端升期待建立极权国家的愿望。可见钱端升此时的研究重心与他的思想倾向大有关系。1934

<sup>①</sup> 《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1页。

年,《德国的政府》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钱端升说他早有把英、美、法、德、日、俄的政府合著一书,取名“欧美日本的政治组织”的计划,但“因年来心神无宁日,迄未能实现”。考虑到“关于英美两国的政府英文的书籍甚是充富。国人懂英文者甚多,故欲知该两国政府的情形容尚不难。惟德法政府的实施情形,即德法的著者亦因偏重公法,未能予以充分注意”,于是决定将德法两国的政府尽先成书,分别付印,而日俄的政府则只能暂付阙如。<sup>①</sup>先行刊印的法国部分就是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的政治组织》。由此可知钱端升在1930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将主要精力放在著述《德国的政府》上,他自己也说这本书“自十八年冬月动笔之日起,迄完成之日止,几达四年之久”<sup>②</sup>。

钱端升比较看重《德国的政府》,晚年还说:“此书原为译述1919年威玛宪法下德国政制和政治生活而作,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基础较厚,在我所著浅薄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sup>③</sup>原著所列参考书多达261种,全部为西文资料。陈之迈称赞“此书的取材异常丰富,观乎书后所附十七页的参考书目便知作者学问的渊深,除法律命令等材料外,德法英文中的重要典籍几浏览无遗,实为我国著作界中所罕见”;“为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贡献。取材的丰富,作者渊博的学识均为我国所绝无仅见者”<sup>④</sup>。

在《德国的政府》出版之后,钱端升将《法国的政治组织》加以修订再版,改名为《法国的政府》,内容较前者大为充实。钱端升在该书“再版序”中指出:“本书虽名再版,实等新著。除第一,第三,第五及第八等四章大体上尚保留原版文字外,其余各章均是重写过的。”陈之迈对这本书也给予较高评价:“在中文书里现在还没有法国政府良好的教材,这本书是足以补此缺憾的。在这本书里钱先生没有用很多所谓原始材料(与《德国的政府》不同),但英法文的普通书籍及专门著作几被参考无遗(此书附有十三页的参考书目,九成以上都是法文的),并征取材的广博。加之,钱先生为学谨严的态度使此书所叙的事实正确无

① 参见钱端升:《法国的政府》,“再版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②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③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697页。

④ 陈之迈关于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和Herbert Kraus著的*The Crisis of German Democracy*的书评,载《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1934年10月。